

林慶彰 主編

#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

花木蘭  
文化出版社  
出版

# 中國學術思想

研究輯刊

初編

林慶彰主編

第16冊

論常州學派之學術特質與其經世思想

江素卿著

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論常州學派之學術特質與其經世思想／江素卿 著——初版——

台北縣永和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8〔民97〕

目 2+164 面：19×26 公分

（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：第 16 冊）

ISBN：978-986-6657-88-7（精裝）

1. 清代哲學 2. 學術思想

127.0199

97016262

ISBN - 978-986-6657-88-7


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

初編 第十六冊

ISBN：978-986-6657-88-7

---

論常州學派之學術特質與其經世思想

---

作 者 江素卿

主 編 林慶彰

總編輯 杜潔祥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[sut81518@ms59.hinet.net](mailto:sut81518@ms59.hinet.net)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

初 版 2008 年 9 月

定 價 初編 28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46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# 論常州學派之學術特質與其經世思想

江素卿 著

## 作者簡介

江素卿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。

現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。

曾開設課程有：大學部——中國思想史、經學通論、楚辭、韓非子、史記、紅樓夢等；  
研究所——史記學討論。

目前研究集中於經學史、經學思想、史記學等領域。

## 提 要

常州學派興起於清代中葉，論常州學派可有許多界定標準，清儒治公羊者，以孔廣森《公羊通義》成書最早，惟孔氏不重公羊家法，梁啟超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批評其書違失傳旨甚多，而以莊存與為清代公羊學之初祖，並為常州學派之開創者；本文敘述常州學以與經世思想相關之議題為研究重點，故從梁說自莊氏始。莊存與之學，傳其外孫劉逢祿、宋翔鳳而奠定學派之規模，其後更由龔定盦與魏源之引申發揮，而使經世思想大昌於時，故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為莊存與、劉逢祿、宋翔鳳、龔定盦、魏源等五位學者。

第一章〈常州學派之形成及其背景〉，分別由地理環境、人文風氣、師承關係，及政治、社會環境、學術傳統等因素，分析常州學派形成之時代背景，進而探究這些因素交互影響下，常州學派之發展歷史。

第二章〈常州學派經學之特質〉，首先分析經學觀念與今文經學之精神，然後分節論述常州各學者治經之特質。

第三章〈常州學派之史學史觀及其經世思想〉，論公羊史觀為一種歷史哲學，但常州學者之公羊史觀卻又非嚴格意義之史觀，他們重在利用公羊哲學中與歷史相關之議題，發揮其經世思想，最明顯者為龔定盦之靈活運用三世論，而成就最大者應推魏源史學著述中之經世實踐。第四章〈常州學派之實務思想及其時代意義〉，清代中葉以下之政治問題，可謂千瘡百孔，要以清廷嚴分滿漢畛域與資格限人為核心問題，種種弊病皆由此而衍生。常州學派治學精神，既在經世致用，檢視其對此時代問題之論點，一方面可分析其學術特質，一方面則可以此衡論其經、史學之時代意義。



# 目

#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前 言 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|
| 第一章 常州學派之形成及其背景         | 3  |
| 第一節 常州學派形成之地理環境與師承關係    | 3  |
| 一、地理環境與教育風氣之蘊育          | 3  |
| 二、常州學者之師承關係             | 6  |
| 第二節 常州學派形成之時代因素及其發展     | 11 |
| 一、政治與社會環境之激盪            | 11 |
| 二、傳統學術之繼承與革新            | 13 |
| 三、常州學派發展之轉折             | 15 |
| 第二章 常州學派經學之特質           | 19 |
| 第一節 莊存與通經致用觀與所謂「祕不示人」之學 | 24 |
| 一、莊存與通經致用思想之學術淵源        | 24 |
| 二、莊存與通經致用之意義與「祕不示人」之隱衷  | 26 |
| 三、莊存與通經致用之方法            | 28 |
| 第二節 劉逢祿之系統化公羊學          | 31 |
| 一、三科九旨的歷史發展             | 34 |
| 二、劉逢祿對三科之組織             | 36 |
| 三、劉逢祿對九旨之闡釋             | 38 |
| 第三節 宋翔鳳本公羊以治《論語》之新徑     | 41 |
| 一、《說義》對《論語》章句之引申發揮      | 43 |
| 二、《說義》論為政之道             | 47 |
| 第四節 龔定盦援經議政之要點          | 49 |
| 一、龔定盦經學思想之淵源與特質         | 49 |
| 二、龔定盦對公羊義法之發揮           | 52 |
| 第五節 魏源治經之歷史意識           | 55 |
| 一、魏源兼通經史之學術性格           | 55 |
| 二、《詩古微》一書中所從事之歷史情境還原工作  | 58 |
| 第三章 常州學派之史學史觀及其經世思想     | 63 |
| 一、公羊史觀與歷史哲學             | 63 |
| 二、中國傳統中之史學經世思想          | 65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節 莊存與、劉逢祿、宋翔鳳之公羊哲學史<br>觀及其經世思想 | 66  |
| 一、莊存與之史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6  |
| 二、劉逢祿之史觀與史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7  |
| 三、宋翔鳳之公羊史觀與所寓寄之復古意識              | 69  |
| 第二節 龔定盦之尊史思想與其三世論                | 70  |
| 一、龔定盦尊史思想之內容及意義                  | 70  |
| 二、龔定盦之三世論及其運用                    | 74  |
| 三、龔定盦史學之價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6  |
| 第三節 魏源之經世史觀及其著作                  | 77  |
| 一、魏源之經世史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7  |
| 二、魏源史學著述之經世實踐                    | 80  |
| 第四章 常州學派之實務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             | 85  |
| 第一節 常州學者所面對之時代問題                 | 85  |
| 第二節 常州學者論政之特點及其時代意義              | 87  |
| 一、莊存與論「內外」關係與譏刺世卿之思想             | 87  |
| 二、劉逢祿所主張之經術實務論                   | 89  |
| 三、宋翔鳳用世之情與其實務之論                  | 91  |
| 四、龔定盦之實務思想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2  |
| 五、魏源之實務思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7  |
| 結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7 |
| 附錄：常州學者大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1 |
| 參考書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7 |
| 附錄一：從《漢書·五行志》論西漢春秋學特色            | 127 |
| 附錄二：論章實齋之準經衡史                    | 145 |

# 前 言

乾嘉學術在外在政治環境的箝制，及明末以來回歸經典的學術內在發展的雙重因素下，形成學術走向樸學的新風氣，對經典的整理取得頗為豐碩的成就。但考據學形成之後，學者漸漸沉溺於故紙堆中，考據雖精而不濟國計民生之用。歷來發揮經世思想的經史之學，也成為章句訓詁與歷史考證之學，學術的實用價值，淒微至極。

直到常州學派興起，學術的經世思想才再萌芽斃，漸次而蔚為風氣，影響及於清末公羊學及光緒朝的改制變法。梁啟超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，論清儒整理舊學的總成績，於公羊學項下，雖以孔廣森之《公羊通義》為清儒治公羊之最先者，卻批評孔氏不通公羊家法，其書違失傳旨甚多；梁氏以莊存與為清代公羊學之初祖，亦是常州學派之開創者。其後學者多從梁說，本文敘述常州學亦從梁說自莊氏始。

莊氏著《春秋正辭》，發明《春秋》的微言大義，又提倡通經致用，其後由外孫劉逢祿及宋翔鳳繼承微學。劉氏以公羊義遍釋群經，其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》更系統的歸納了何休《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》的義例，示治公羊者以途徑；宋翔鳳專力公羊化論語學，謂《論語》與《春秋》相通，亦含孔子的微言大義，於是公羊學大昌於時，公羊義理推擴到四書五經，造成今文經學的全面發展。劉氏又傳《公羊春秋》於龔定盦、魏源、凌曙，宋翔鳳則傳於戴望等，其中尤以龔、魏，善於援引公羊義理，議論時政，使公羊學更加發揚光大。

蕭一山先生著《清代通史》，以清代的今文學運動與西方文化輸入，為同時影響中國前途的兩大途徑。今文學運動之結穴歸於晚清。在著作方面，陳



立的《公羊義疏》七十六卷，被譽為公羊學自董仲舒、何休之後的第一功臣；在政治上則有康有為、梁啟超師生，倡春秋公羊學以改制變法。雖然百日維新在政治上只如曇花一現，卻開出晚清思想界的革命潮流，影響中國近代史實甚為深遠。其芽孽既萌於常州學派，則剖析常州學派之發展，當有助於掌握整個清代今文經學運動的來龍去脈。

復次，公羊義法中張三世、通三統之義，均企圖對歷史的發展提出規範性的解釋，公羊家的原始精神雖非史學性格，其史觀甚至也有可商議之處，但以史說經、借古諷今，卻是學者「致用」的基本方法。因此，透過其解釋歷史的觀點、史論、史學著作等，以與公羊以外的相關論著比較，當不失為另一種了解其學術特質的角度，亦能進一步掌握其經世思想。

常州學派除利用經史之學表現其經世意態外，對於時代問題之著重點何在？各學者所謂的解決方案，與其學術思想有何關連，皆當加以釐清。

常州學派的學術特質既在經世致用，則評價其得失之關鍵應視所論之適用與否。抑揚過度，均非的論。拙文擬分析其經學、史學、實務思想之特質，並針對其學術之時代意義作出探討，以評價其得失。

# 第一章 常州學派之形成及其背景

歷史是時間的線索，地理是空間的範疇，學派的發展是沿此時間之線索，而在地理環境的空間中向前演進，故欲認識一個學派的特色，對其地理環境、歷史背景等加以研究，是基礎而且必要的。

常州學派起自乾隆年間，嘉道以下逐漸發展、壯大，流衍甚廣。其學術精神，迥異時趨，當時學者如阮元、李兆洛等已指出常州學者的治學精神；稍後如章太炎、劉師培等已注意整個學派的發展（詳見本章第二節）；結果卻「學術、治道，同趨漸滅」。<sup>〔註1〕</sup>其經世思想未能挽救腐化的治道，經學性質也隨著時運而不得不變，則常州學派形成時所面臨的變局，似不下於明末清初所謂「天崩地解」的時代，而經世思想乃環繞時代問題而發展，歷史的動盪，又轉而影響地理及人文，故其相互影響之關係，亦頗值得深思。

## 第一節 常州學派形成之地理環境與師承關係

### 一、地理環境與教育風氣之蘊育

有關地理環境對人文的影響，自古以來學者討論極多，其著眼大致有兩個方向，一是從自然環境對人類思維或文化習性之影響著眼，如《漢書·地理志》即從地理條件，分析漢代人文之發展；近代梁任公之〈地理與文明之關係〉、〈亞洲地理大勢〉、〈中國地理大勢論〉<sup>〔註2〕</sup>等文，均以地理決定論，

〔註1〕 見錢穆著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0），頁525。

〔註2〕 見氏著：《飲冰室合集》第2冊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89）。

為解釋中國歷史進化的基本理論。其在西方，古代有亞里斯多德以及啓蒙時期之法國孟德斯鳩，乃至較後之德國黑格爾及英國之巴克等人之研究。其中黑格爾有最簡潔明晰之分析，他曾說：

助長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繫，就是地理的基礎；假如把自然的聯繫同道德「全體」的普遍和道德全體的個別行動的個體比較起來，那麼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；但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「精神」所從而表演的場地，它也是一種主要的、而且必要的基礎。〔註3〕

另一方面，則就地域所已有之人文傳統，討論某一時期文化活動在空間分配上之交互作用與影響。此一方面，西方近代之觀念史分析學者論述極多，如鮑莫爾即對十七世紀以來觀念史之發展及其對人文之影響，有深入的討論；〔註4〕中國於清光緒年間亦有梁任公、劉師培之先趨研究。梁任公〈中國學風之地理分佈〉一文，以研究學者產地為主，他說：

氣候山川之特徵，影響於住民之性質，性質累代之蓄積發揮，衍為遺傳，此特徵又影響於對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質上生活，還直接間接影響於習慣及思想，故同在一國同在一時而文化之度，相去絕遠，其質及其類不相聚，則環境之分限使然也。〔註5〕

因此，產生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；劉師培〈南北學派不同總論〉則從五胡亂華，衣冠南遷等歷史事件，及經濟消長因素，解釋「三代之時學術興於北方，而大江以南無學，魏晉以後南方之地日昌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後」〔註6〕的原因。

第一種研究所論的自然地理，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人文的發展，但影響的程度難以評估，以今天學術研究的要求而言，較難令人信服；第二種研究，雖然也不是精確的科學分析，但這些可資檢驗的統計資料，毋寧是較俱有說服力的。〔註7〕

〔註3〕 見氏著，王造時譯：《歷史哲學·歷史的地理基礎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4），頁131。

〔註4〕 詳見鮑莫爾 Franklin L Baumer 著，李日澤譯：《西方近代思想史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8）。

〔註5〕 見氏著：《飲冰室合集》第5冊，頁50。

〔註6〕 見《劉申叔遺書》（一）（江蘇：古籍出版社據寧武南氏1934校印本影印），頁549。

〔註7〕 關於歷史地理學的問題，今人李映輝亦發表：〈歷史地理學在歷史研究中之

在自然條件方面，常州是個經濟繁榮，民生富庶的地區，〔註8〕為學術的蘊育，提供良好的條件；然而，常州能形成一個學派，所當特別注意的是它濃郁的學術風氣。李兆洛說：

余每憶三十年前，吾鄉風俗之美，物力之豐，家有中人產以上，輒  
麀然向學，子弟之才美可造者，必延師而教之。〔註9〕

莊存與及劉逢祿均出身世宦之家，家學淵源，自幼致力於經史之學，是較為自然之事；宋翔鳳家貧，至竊衣物以易書，重視教育的風氣對他的嗜讀古書應有所影響。劉、宋二人皆曾留在常州，從舅父莊述祖受業。因人文薈萃，龔定龢、魏源先後遊學常州。龔定龢詩曰：「天下名士有部落，東南無與常匹儔。」〔註10〕由此足見常州重視教育之一斑。

古人學而優則仕，故從科名的盛衰觀察，亦頗能代表地域性「文化水準」之高下。世所羨稱之三鼎甲，常州人如狀元有呂宮、趙熊詔、錢維城；榜眼有楊述曾、莊存與、孫星衍、洪亮吉、袁績懋；探花有錢名士、湯大紳、趙翼、劉躍雲等。〔註11〕

又仕而優則學，乾嘉以來，常州之學者，如莊存與、莊述祖、趙翼、洪亮吉、孫星衍、張惠言、臧庸、劉逢祿等，均有極受肯定的學術成就；李兆洛亦嘗指出：草堂諸子「斐然以發名成業相砥礪」，這些人文風氣為常州學派的形成及發展，提供有利的條件。〔註12〕

---

作用），《歷史學》，1994年4月，頁97~100；張國艷著：〈東方地理環境與中國歷史發展〉，《歷史學》，1989年10月，頁79~83；張國豔、黃長義著：〈地理史觀與中國近代史學的歷史考察〉，《學術研究》（廣東：宏遠發展總公司），1992年5月，頁92~96。均可參考。

〔註8〕常州府的地理位置在江蘇省東南方，距省治二百八十里。順治初年，因襲明制，治五縣，至雍正二年，以賦重事繁改為八個縣：包括武進、無錫、陽湖、金匱、江陰、宜興、荊溪、靖江。參見趙爾巽等撰：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）。

〔註9〕見李兆洛著：《養一齋文集·江湖詩集序》（道光23~24年維風堂聚珍本）。

〔註10〕見氏著：《龔定庵全集類編·常州高材篇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0），頁368。

〔註11〕參見沈雲龍著：《近代史事與人物》（臺北：文海書局，1971），頁42。

〔註12〕參見陸寶千著：〈愛日草堂諸子——論常州學派的萌坼〉《近史所集刊》，第16期（中研院近史所，1987年6月），陸氏論列了常州學派形成前，祝百十、周伯恬、張惠言、張翰風、陸繼輅、陸耀橘、莊綬甲、劉逢祿、洪飴孫、丁履恆、李兆洛等人交誼，和其經世思想的蘊釀。

## 二、常州學者之師承關係

中國學術有明顯的人文精神的傳統，雖然聖人是根據道而有所作，但道須俟聖人而後明，所謂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因此，一部二十四史主要是人物傳記，如《史記》一百三十卷，僅世家、列傳就占了一百卷，《漢書》一百卷，傳記占了七十，就是重視人物在歷史演進中的主動力量。西方也有類似的觀念，希臘人認為歷史的發展途徑是可變的，而且容易由受過良好知識訓練的人的意志來作有益的修正。〔註 13〕希臘之後，此種人文思想沉寂多時，至法國地理學家維地爾才告復甦，他批評「地理命定主義」，認為地域是提供人類自由選擇之園地，而非支配人類命運的因素。英國之巴克也指出：

地理具有各種可能性，任人選擇，非可視之為決定命運之整個力量。

〔註 14〕

強調人類是處在不斷的創造新的可能性中，他舉例說英國的發展具有海陸兩種可能性，且為永遠存在之可能性。故在歷史與文化的發展中，多見環境相同，而發展異趣的情形。

這種由人為主導的歷史現象，在學術研究上也有類似的情形，章學誠「浙東貴專家，浙西尚博雅，各因其習而習也。」〔註 15〕之說，即指出浙東與浙西，自然條件相近，而因「習」的不同，使學風各具特色。此所謂「習」，即人文傳統。學風形成及轉變，賴大學者突破傳統或環境的限制，開風氣之先，其學風流行，常有沛然莫之能禦之勢。莊存與生值乾隆漢學方盛之時，卻能洞識機先，鄙棄鉅釘瑣碎的考證學，致力於通經致用，其於常州經世學風的興起，即有開創啓迪之功。其後，經劉逢祿、宋翔鳳、龔定盦、魏源的努力，使常州學派形成獨特的學術風格，並且風靡天下，其影響及於晚清之學術及政治的發展。故人文傳統對於地域性學風的形成，關係至鉅。

但對於地域性學派劃分之標準，學者論見頗有出入，暴鴻昌先生曾界定以地域名學派，必備三個條件：

其一，此流派必皆同一地域之人；其二，治學宗旨及學術風格迥然別於其

〔註 13〕 參見柯林烏 R.G.Collingwood 著，陳明福譯：《歷史的理念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 3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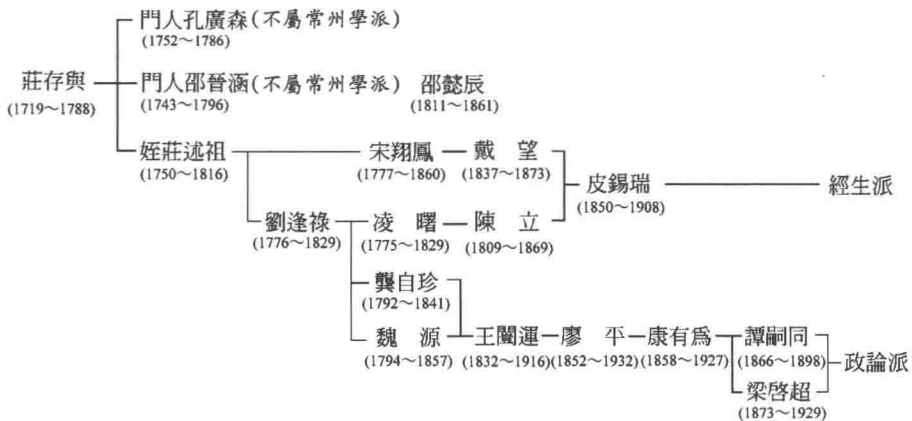
〔註 14〕 見巴克 Ernesat Barker 著，王世憲譯：《民族性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），頁 77。

〔註 15〕 見氏著：《文史通義·浙東學術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4），頁 523。

他地域而自成特色；第三，其獨特之學術風格，源遠流長，師承有緒。〔註16〕然而學派的發展有源有流，學派形成之後，其影響所及，往往超過地域限制，且代表學派之地望，常又成爲學術風格之代稱，此時若有聞風而起，慕義從學，或有師承關係而繼承、發展此一學派精神者，均可視爲該學派之人。因此，拙文認爲學派或地域性學派之劃分標準，可從三方面加以觀察：其一，學派之傳承譜系，此即暴氏所論的地域和師承關係；其二，當時學者的評論，即暴氏所論治學宗旨與學術風格的問題；其三，後世學者的評價，一個學派或思想潮流，可能風靡一時，但影響未必深遠，要給予合理的定位，後人的評價，往往更加客觀，因此在暴氏所論的三點以外，亦應注意後人評價的意見。

莊存與，字方耕，武進人，爲人耿介廉直。門人孔廣森、邵晉涵未得其真傳。莊存與之姪，莊述祖，字葆琛，傳存與之學，研求精密，於世儒所忽者，覃思獨深，洞見本末。述祖之甥劉逢祿、宋翔鳳。劉逢祿，字申受，武進人。幼傳外家莊氏之學，爲學務通大義，不專章句。宋翔鳳，字于庭，長洲人。通訓詁名物，志在西漢家法、微言大義。龔自珍，字璉人，仁和人。魏源，字默深，邵陽人。龔、魏二人均受《公羊春秋》於劉逢祿，亦皆負才自喜，名亦相埒。〔註17〕

常州相關學者系譜：



莊存與之學，初由子姪而得其真傳，至劉宋皆爲近親關係。〔註18〕至龔、

〔註16〕 見氏著：〈乾嘉考據學流派辨析——吳派、皖派說質疑〉，《歷史學》，1992年9月，頁60。

〔註17〕 參見《清史稿》，列傳92；列傳269；列傳273。

〔註18〕 今人陸振岳曾說：公羊學的常州諸學者，有一個明顯的特點，這就是他們之

魏才是師生的關係，劉逢祿曾授龔自珍與魏源《公羊春秋》，於二人會試落第，又賦〈兩生行〉惜之。〔註19〕觀其辭意可謂知之甚深，愛之甚切。因此，不惟魏源對劉逢祿終生有知遇之感，龔定盦對劉逢祿也非常的傾慕，有詩曰：「昨日相逢劉禮部，高言大句快無加。從君燒盡蟲魚學，甘作東京賣餅家。」又曰：「端門受命有雲初，一脈微言我敬承。宿草敢挑劉禮部，東南絕學在毘陵。」龔自珍又極推崇宋翔鳳，有詩曰「萬人叢中一握手，使我衣袖三年香。」〔註20〕由這些言論和行事之中，其師弟間一脈相承的精神、相知相惜的情感，已昭然可睹。

常州學派治學之獨特精神，在存與身後就引起學者的注意，如阮元〔註21〕、董士錫〔註22〕均注意到莊存與重六經微言之精神，魏源〔註23〕說莊存與之學在當時雖不受重視，但他關心世道的精神，才是學術發展的正確途徑，定盦更肯

---

間是近親的群體。……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家學的作用。參見〈關於清代今文經學的幾個問題〉，《蘇州大學學報》，1994年3月，頁108。

- 〔註19〕李孟符曰：「道光丙戌會試，劉申受先生為同考官，得龔定庵卷，狂喜，亟薦之。魏默深卷在某侍御房，某侍御得卷，猶疑不遽薦。禮部讀其文而大異之，乃捉令亟薦，故魏默深於禮部終身有知己之感焉。然龔魏竟皆下第。先生痛惜之。贈以詩云：三江人文甲天下，如山明媚畫嶙峋。盎盎春溪比西子，浣花濯錦裁銀雲。……翩然雙鳳冥空碧，會見應運翔丹宸。萍蹤絮影亦偶爾，且看明日走馬埴城闈。」見氏著：《春冰室野乘·前輩愛材之篤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67），頁117~118。
- 〔註20〕以上引文分別見於氏著：《龔定庵全集類編·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·己亥雜詩·投宋于庭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0），頁396；頁328；頁368。
- 〔註21〕阮元〈莊方耕宗伯經說序〉曰：「于六經皆能闡抉奧旨，不專專為漢宋箋注之學，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，斯為昭代大儒，心竊慕之。……所學與當時講論或枘鑿不相入，故祕不示人。通其學者，門人邵學士晉涵，孔檢討廣森及子孫數人而已。」收入《味經齋遺書》，是書藏於台大文圖善本書室，共十一冊。
- 〔註22〕董士錫〈莊氏易說序〉曰：「其為文，辯而精，醇而肆，旨遠而義近，舉大而不遺小，能言諸儒所不能言，不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別流，而知者以為乾隆間經學之巨匯也。方乾隆時，學者莫不由《說文》、《爾雅》而入，醇深於漢經師之言，而無溷以游雜。其門人為之，莫不以門戶自守，深疾宋以後之空言。固其藝精，抑示術峻，而又烏知固有為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！」（見《味經齋遺書》）。
- 〔註23〕魏源〈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〉說：「清有天下百餘年間，以經學名家者數十輩，獨先生未嘗支離鈿析，如韓、董、班、徐四子所識，是以世之為漢學者罕稱道之。烏虜！公所為真漢學者庶其在是！」見《魏源集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8），頁237。

定其學術有「陰濟天下」的價值。〔註 24〕從他們的論述，可知莊存之學，在當時雖不敢張揚，但他治學的苦心孤詣，已為常州學派的發展，奠定了基礎。

逢祿之學，李兆洛〔註 25〕、魏源〔註 26〕亦指出他不泥守章句，獨重董仲舒、何休發明《春秋》微言大義的精神。戴望〔註 27〕則謂逢祿為時人所推服者，尤其在援古事、據經義以處理政事方面，並謂其能有董相之風。〔註 28〕

翔鳳生平除史傳之外，未見碑傳材料，交遊雖多，求時人對他的論述，寥不可得，史傳謂其志在西漢家法，微言大義，得莊氏之真傳。

段玉裁指出定齋經史研究，有為今病而作之意；〔註 29〕魏源則更清楚的道出他關心世情民隱的精神。〔註 30〕

魏源的經學研究，逢祿引為同志，〔註 31〕李兆洛稱其獨見；〔註 32〕莊

〔註 24〕 龔定盦說：「學足以開天下，自韜污受不學之名，為有所權緩亟輕重，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。其澤將不惟十世，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，百年一人而已矣。」（《龔定庵全集類編·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》，頁 295）。

〔註 25〕 李兆洛〈禮部劉君傳〉說：「研經《公羊》，探源董生，發揮何氏，成《釋例》三十篇，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，挹損之文辭洞然，推極屬辭比事之道，又成箋說、答難、決獄等凡十一書，自漢以來未嘗有也。」收入《清代碑傳全集》（江蘇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1180。

〔註 26〕 魏源說：「清之興二百年，通儒輩出。……于東京之學，蓋盡心焉。求之西漢賈、董、匡、劉所述，七十弟子所遺，源流本末，其尚盡合乎？其未盡合乎？有潛心大業之士，翼翼然，竺竺然，由董生《春秋》以窺六藝條貫，由六藝以求聖人統紀，旁搜遠紹，溫故知新，任重道遠，死而後已，雖盛業未就，可不謂明允篤志君子哉？」見《魏源集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8），頁 242～243。

〔註 27〕 氏著：〈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〉說：「其為學務通大義，由董生《春秋》窺六藝，求觀聖人之志。」收入《清代碑傳全集》，頁 1180。

〔註 28〕 見《清史稿：儒林傳》，列傳 269，頁 11099。

〔註 29〕 段玉裁曰：「自珍見余吳中，年才弱冠，余索觀其所業詩文甚夥，聞有治經史之作，風發雲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」又說：「（《明良論》四篇）四論皆古方，而中今病，豈心別製一新方哉，毫矣，猶見此才而死，吾不恨矣。」前段文見《段玉裁遺書》（臺北：大化書局，1977），頁 1035；後段文見《龔定庵全集類編·明良論（附記）》，頁 138。

〔註 30〕 魏源謂自珍：「於經通《公羊春秋》，於史長西北輿地。其文以六書小學為入門，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，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幹。晚猶好西方之書，自謂造深微云。」（見《魏源集·定庵文錄敘》，頁 239）。

〔註 31〕 其言曰：「邵陽魏君默深，治經好求微言大義。由董子書以信《公羊春秋》，由《春秋》以信西漢今文家法。……其志大，其思深，其用力勤矣。予向治《春秋》今文之學，有志發揮成一家言，作輟因循，久未卒業，深懼大業之陵遲，



廂南、〔註 33〕左宗棠〔註 34〕雖未論其治經精神，對其經世才學，都推崇備至。

論常州學派之學術特質，後世學者亦頗不乏人，如：章太炎標舉常州學者治經的個別特色；劉師培強調學者間的師承關係；梁啟超重其經世致用的精神；錢賓四先生以學派發展到論政的關鍵人物是龔定盦；張舜徽則認為學派形成之後，不必再以地域區分標準。〔註 35〕雖然所著重分析的焦點不同，但以莊存與開派，劉、宋、龔、魏繼承和發展其學術精神，除章太炎對龔魏別有異見外，〔註 36〕以此五人為常州學派最重要的學者，則是論者共同的見解。

此外，常州學者尚有惓敬，著《三代因革論》，探求前史興敗治亂之故；張惠言，雖以詞名家，不廢經學，研究《周易》，主虞氏，著《周易虞氏易》，研究禮經，宗鄭氏注，注《儀禮圖》；李兆洛，治《通鑒》、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之學，疏通知遠，歸於致用。他們學術的趨向，都顯然和並世諸儒異趣，都有學者視為常州學派。但因拙文著重在深關時政的經世思想，故擇取以公羊

負荷之隕越。幸遇周志勇任斯道，助我啓予。……」（見氏著：《劉禮部集·詩古微序》（道光十年刻本，無頁碼，以下引此書只註篇名、卷數），卷 9。

〔註 32〕李兆洛〈詩古微序〉說：「鈇割數千年來相傳之篇第，掇擊若干年來株守之序箋，無獨是之見者然乎？然而其所鈇割者，所掇擊者，質之以傳記，平之以經文，比款別腴，左右交會。其綜之也博，其擇之也卓，其會之也密，其斷之也慤，守獨是之見者然乎！」（見《詩古微·序》），收入《魏源全集》第 1 冊。

〔註 33〕蔣廂南《七經樓文鈔·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》曰：「吾因讀其書而私淑其人，其當吾世而獲從捧手者，有劉禮部申甫、龔禮部定庵、魏刺史默深。三君精西漢今文之家法，而又通本朝之掌故。……劉君之文，子政、子雲之流亞也；龔君之文，子長、孟堅之流亞也；魏君之文，管仲、孫武之流亞也。」引自李伯榮著：《魏源師友記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），頁 124。

〔註 34〕《左宗棠書讀·三十四庚辰答陶少雲書》卷 20 曰：「道光朝講經世之學者，惟默深與定庵。實則龔博而不精，不若魏之切實而有條理。近料理新疆諸務，益嘆魏子所見之偉為不可及。改設郡縣，龔議多不可行。蓋未親歷其境，不習知山川條列，故所擬見置，大略多舛錯。惟如今制，邊腹不分，治兵之官多，治民之官少，求其長治久安，必不可得，定庵之議固不磨矣。」見《魏源師友記》，頁 143。

〔註 35〕參見章太炎著：《煇書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），頁 24~25；劉師培著：《劉中叔先生叢書》（臺北：大新書局），頁 668；梁啟超著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 29；錢穆著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頁 532；張舜徽著：《清儒學記》（大陸：齊魯書社，1991），頁 481。

〔註 36〕章氏謂：「龔自珍不可純稱今文」，魏源「不得附常州學派」，但亦肯定「龔氏之學，源於莊劉」，魏源「乃思今文為名高」，此即承認龔魏二人與常州學派之關係，見氏著《煇書》，頁 24~25。